

文化人邂逅星洲——从 1939 年谈起



姚梦桐

怡和世纪第 48 期

2023 年 9 月 15

<https://www.yiheshiji.com/post/%E6%96%87%E5%8C%96%E4%BA%BA%E9%82%82%E9%80%85%E6%98%9F%E6%B4%B2-%E4%BB%8E1939%E5%B9%B4%E8%B0%88%E8%B5%B7>

1938 年 10 月 10 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礼堂召开，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泰国、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华侨代表 168 人出席，为南洋华侨史上空前盛会。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推举陈嘉庚为主席。**1** 一个统一并巩固后援阵线的组织宣告成立。

风云际会，1939 年中国文化人郁达夫，徐悲鸿，王莹，金山以及司徒乔在星洲邂逅，给本地艺坛演绎了一段段艺术传奇。

1938 年 12 月 28 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聘南来星洲宣传抗日活动；1939 年 1 月 9 日徐悲鸿为举办筹赈画展抵达星洲，经郁达夫的介绍认识王莹，他在黄曼士的江夏堂画了《放下你的鞭子》；王莹于 1939 年 9 月 30 日和三名女团员抵达星洲，金山与十几位团员辗转绕道，在 1940 年 4 月前后与王莹等人会合。之后，王莹与金山筹组新中国剧团，并由星华筹款会呈请立案，经华民政务司批准得以在新加坡、马来亚义演。画家司徒乔和妻子冯伊湄带了三个孩子到达仰光，之后全家迁移到槟城。1939 年底南下星洲以画像为生，隔年正碰上新中国剧团的演出，机缘巧合，也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

郁达夫投荒南洋，绝非为了饱览热带风光，其诗“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说得很明白。1939 年 2 月 8 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志愿回国以尽国民天职。**2** 南侨总会号召年轻的司机与技工回国服务，得到热烈响应。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繁星发表《送华技工回国服务》《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技工同志》，他对技工表示热烈敬意，殷殷忠告，身处不同环境，气候，风俗习惯，语言，切莫懊恼或灰心。

在国土沦丧，危急存亡之秋，郁达夫深知国家需财殷切，因此徐悲鸿筹赈画展，新中国剧团的筹赈祖国伤病难民的活动，都撰文广为宣传，他赞誉艺术报国的苦心：

悲鸿先生.....见了那些被敌机烂施轰

炸后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

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绝大的酸楚与

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

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或所得的义捐金全部，

或者将很有效地，用到这些地方去.....。3

新中国剧团抗战筹赈的演出，郁达夫发表了三篇介绍文字：《看王莹女士等的演剧》⁴，《<塞上风光>之演出》以及《看<永定河畔>的演出》。⁵ 他赞扬“《放下你的鞭子》这一出街头剧，在徐州前线，在国内各地，以及到了马来亚以后，看武汉合唱团所演的，总共也有十几次的光景，但仔细比较起来，却觉得以这一次为最出色。”⁶

郁达夫的宣传文字，让侨民理解艺术家精湛的艺道，赞誉新中国剧团以艺报国的崇高精神，以期侨民万众一心，慨慷解囊，响应筹赈。

徐悲鸿筹赈画展，3月15、16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18日至26日移到中华总商会。展出期间，任职于《星洲日报》的徐君濂，以笔名“宗生”发表了《徐悲鸿画展及其他》，对画展做出高度的评价。在赞赏声中，也掀起一圈非议的涟漪，1939年4月17日陈振夏针对徐悲鸿《田横五百壮士图》提出意见：“既是以历史事实为画题，那么画中人物的衣服，形貌，不应该和时代悬殊。”³ 天后，徐悲鸿发表《历史画之困难——答陈振夏先生》，文中说：“艺术品之产生，皆基于热情，考据自不可忽，但止于相当程度。.....画若与黄山谷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乃貌合而神离。”

陈振夏又发表《读过<历史画之困难>之后——再向徐悲鸿先生贡献一点意见》《我对于历史画的观感》，对此徐悲鸿并没有答复。战前新加坡美术圈里，画家与观众各自提出意见，彼此交流是非常罕见的事。

考虑展期过长，徐悲鸿画展从24日起展览名家作品，“计有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吴作人、汪亚尘、黄君璧、谢公展、孙多慈等，此外百余件徐氏所藏各国著名油画亦将展览。本地画家郑可，张汝器，林学大，高沛泽、徐君濂等也有作品参与展出。”⁷ 这则新闻报道，我深感到惊讶，究竟徐悲鸿携带了多少名画南来举办筹赈画展？

研究徐悲鸿的学者华天雪在《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的鸿文中指出，徐悲鸿出游南洋所携带的“除了1000多幅自己的代表作、法国留学时期的素描和欧洲各大博物馆的世界名画的摹本，还有他历年搜集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和中国近代画家任伯年、居巢、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赵少昂、吴作人、黄君璧、溥雪斋等画家的数百幅作品（其中

任伯年与齐白石的便有 200 多幅), 以及陶瓷、文玩、珍本印拓书刊等。”⁸ 为祖国伤病难民筹赈, 为宣扬中华文化, 当然是主因, 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学者华天雪的疑问——“若仅仅是为举办筹赈画展办, 何以连瓷器这类极不适宜长途搬运的收藏以及早年的速写练习都要带上?” 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图1 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1939年，油画，144x90cm

王莹抵达新加坡后，经郁达夫介绍结识了徐悲鸿并成为挚交。1939年徐悲鸿请王莹到江夏堂，绘下名画《放下你的鞭子》。画成之后，题上“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并落了款“二十八年十月悲鸿客星洲。”（图1）表达了徐悲鸿对抗日女杰王莹的敬佩。画中的她身穿白底蓝纹的服饰，穿金戴玉，手中红绸飞舞，把王莹画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人。

1939年11月18日徐悲鸿应中印文化协会主席泰戈尔之邀远赴印度，1940年12月13日下午回返新加坡。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义演从1940年6月14日到7月21日为止，从时间上说明了徐悲鸿没有机会观赏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演出。该画场景的时空模糊错乱，屋舍、群众的穿著以及军人显然不属于新加坡的。当年剧团的美术指导沈剡在1945年曾撰文批评：“以抗战剧情为名，然观画中背景与人物，却唤起人们联想到古时候，新年里，村人在看猴儿戏的场面，给人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从时间上说明了徐悲鸿没有机会观赏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演出。当年演出地点在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新世界日光戏院、快乐世界体育馆、皇宫戏院，并非在新加坡的街头。

司徒乔在新中国剧团公演现场，设想在微弱的灯光下，画家专注台上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以捕捉动人的剧情，然后蘸墨、挥动竹笔；他的太太（冯伊湄）手持小灯随着纸上的线条转移为他采光，画家挥笔，夫人持灯的情景，让人感动。司徒乔以正义与激情为剧中的流浪父女画下无数幅的速写。

公演前各社团，大书局均代售演出券，表演现场的献金更出现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如《永定河畔》闭幕后由半空吊下一个透明献金箱，侨胞纷纷捐出巨款，剧团团员每月只有六元生活费，他们也捐出一百贰拾元助赈，尤其可贵的是王莹献出随身仅有的一只金戒助赈，虽由王声世君以一百元购得奉还，但她坚决献金，仍将戒指捐出。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演出11天，筹得大约11万叻币，时新加坡华侨人口55万9千人，平均每人大约捐出2角钱。

司徒乔特邀王莹与赵洵（金山）到其东陵画室。他们的扮饰一如舞台，室内灯光由时任剧团的美术指导沈剡特别装置，突出香姐“泪眼盈眶，扬眉噉嘴”——那写满国仇家恨的脸庞，激起侨民认清自己的命运和祖国是息息相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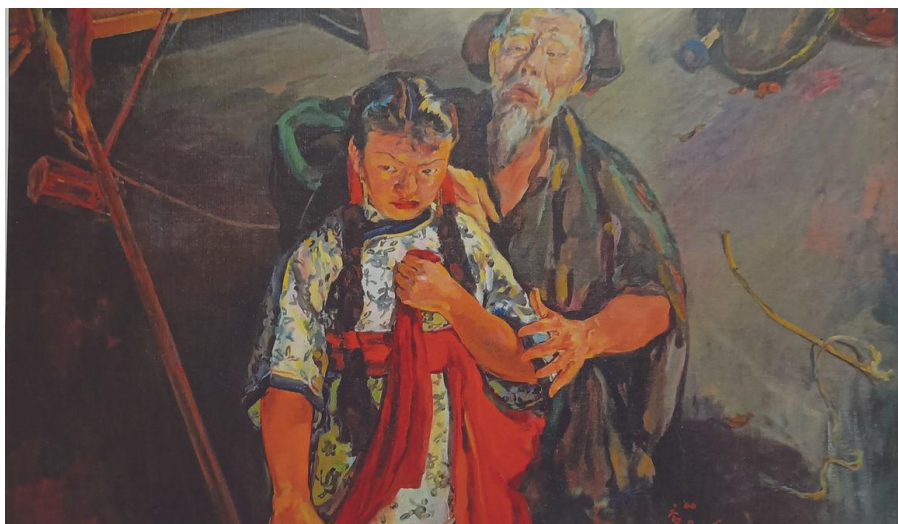


图2 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油画，124x177cm（中国美术馆提供）

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聚焦于老人与香姐间错综复杂的心理刻画：老人悔恨交加，抚怜被鞭后的爱女，香姐泪眼盈眶，扬眉噉嘴。女儿泪眼盈盈似乎想到间接鞭我的是日本鬼子，眉宇间有着无限悲愤，传神之妙，呼之欲出！（图 2）1943 年 1 月 8 日，潘国渠（潘受）《掷鞭图歌并序》发表于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起首四句“老翁掷鞭忽掖女，张口无声泪如雨。女欲有言意更悲，翻身转就老翁抚。”潘先生恰如其分地描绘出画家的主题！

郁达夫、徐悲鸿、王莹以及司徒乔，他们不期而遇，邂逅星洲，给星洲文化艺术留下一段段传奇故事。郁达夫在本地留下极为绚烂的篇章，撰文介绍徐悲鸿，王莹精湛的艺术，郁达夫有诗“悲鸿作画我题诗”，诗画合璧，为艺坛佳话；徐悲鸿 1939 年创作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至今还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出；王莹，金山新中国剧团在星洲演出 11 天，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 4 次，在抗战救亡的大环境中，激起侨胞同仇敌忾；司徒乔结合来自中国剧团的义演与侨民炽热的爱国情怀的氛围而创作的油画作品，在新加坡战前美术史里是绝无仅有的！它见证了在特定历史场景下侨民的爱国情怀。

作者为本地美术史研究学者

注 释

1 《南洋商报》。1938 年 10 月 10 日，页 7。

2 《南洋商报》。1939 年 2 月 8 日，页 7。

3 郁达夫《与悲鸿的再遇》，《星洲日报·晨星》，1939 年 3 月 2 日。

4 郁达夫《看王莹女士等的演剧》，《星洲日报·晨星》，1940 年 3 月 10 日。

5 郁达夫于 1938 年 12 月 28 日应《星洲日报》之聘，南来星洲宣传抗日活动，期间写下大量抗日救亡的文字，对来自中国的画家如翁占秋、徐悲鸿、刘海粟等他都给予大力推荐。请参见姚梦桐《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新加坡：新加坡新社，1987 年 9 月）。

6 同注 4。

7 《南洋商报》，1939 年 3 月 16 日，页 7。

8 华天雪《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载《美术》2013 年底 5 期。

9 《总汇报》，1940 年 7 月 8 日。

10 《南洋商报》，1941 年 2 月 7 日。